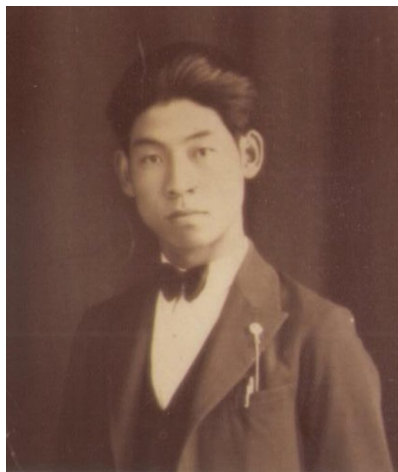




朱宝琛：倾家荡产为抗日



朱宝琛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下关乡岸底村，村东烈士纪念馆里立有一块“岸底战斗纪念碑”，镌刻着“一九四一年八月，八路军雁北支队在下关乡

岸底村南与日寇发生激烈战斗，战斗中支队参谋长朱宝琛、指导员郭波等七十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2014年灵丘县人民政府立下的这块纪念碑，让更多人知道了抗日英雄朱宝琛的事迹。

朱宝琛出生于1904年，是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洪善镇北营村人。七七事变前，朱宝琛家开设平遥面粉公司，并在吕梁离石有店铺，为当地望族，是富裕的晋商人家。

朱宝琛自幼好学，25岁考入北平民国大学，同年由同乡郝德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朱宝琛工作积极热情，在学生界很活跃。1932年，北平学生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大会，他任大会总指挥。平时，他行侠好义、乐于助人。上大学期间，家里给他的费用，他也多半用来周济贫

1937年10月下旬，日军侵占平遥县城，县政府人员及游击队决定撤往吕梁孝义。由于游击队人多，粮食供应面临较大困难，朱宝琛从自家合股

的面粉公司拿出6000余斤面粉献给游击队，并用家中的4辆2套骡马大车运输。他说：“不给日寇留下，献给抗日用。”

1938年12月，中共晋西特委任命朱宝琛为中共汾阳县委书记，后又调往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当时他携爱人、幼子、侄儿和家里的车夫，连同大车和离石店铺的财物，一起参加革命，受到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南汉宸的赞誉：倾家荡产为抗日，全家老少去革命。

1941年秋，日军向晋察冀边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企图占领灵丘县南山的要隘上寨和下关。朱宝琛主动要求带警卫连在岸底、上庆截击，袭扰日军。在一次袭扰战中，他们被日军从侧翼包围。突围中，朱宝琛不幸中弹牺牲。

“在抗战史志的日常宣传中，朱宝琛的故事是必讲的一段经典。”平遥县史志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温小琴

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前不久，平遥县史志研究室带着前来研学山东省院校师生200余人，在古城保卫战旧址重温历史，缅怀为抗日战争而牺牲的英烈。

“在组织社区、校园的日常宣讲中，能明显感受到大家对抗日英烈舍小家顾大家、无畏牺牲精神的震撼和敬仰。”温小琴说，目前，平遥县史志研究室正在筹备《中共平遥县抗日战争回眸》一书的出版，里面收纳整理了朱宝琛等英烈的故事。

“朱宝琛的事迹是抗日英烈奋勇抗战的生动缩影，其精神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北营村村民朱效民说，他和村党支部原书记王秉福等人通过走访、查阅档案资料等方式，收集整理朱宝琛等烈士的革命事迹，希望将红色文化传承下去。“英烈们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值得我们每一代人铭记。”朱效民说。

(据新华社)

裴治云：以生命保留抗联火种

在黑龙省佳木斯市汤原县鹤立镇中心大街，一口直径0.8米的枯井默默诉说着1933年的血色秋天。原日军宪兵队后院的这口井，吞噬了12位战士的生命。其中一位，是来自朝鲜的裴治云，彼时的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书记。

“铮铮铁骨铸就丰碑，十二烈士名留青史。”枯井旁的彩绘墙还原了当年景象。彩绘墙上，浓眉虬髯的便是裴治云。

裴治云1893年出生于朝鲜一个贫农家庭。1920年，他流亡中国东北。1928年，他与中共地下党员金志刚(即崔庸健)相遇，在革命思想启蒙下投身农民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迅速投身抗日斗争，因领导才能突出，1932年出任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书记。

他不足40岁就留出很长的胡须，人们都称他“裴大胡子”“裴老头”。汤

原县档案局(馆)长缴东地说：“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不断努力，汤原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1933年，全县地下党组织已有党员上百名。”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裴治云和其他同志积极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一方面以化整为零的形式深入村屯扩大党的抗日政策宣传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动员党员捐款购买武器。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筹备，全县党员集资购买了10余支长短枪。1932年10月10日，40余名党员集合于汤原城北半截河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汤原民众抗日游击中队。1933年，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组织的反日义勇军进攻县城，惊动了日伪当局，日伪军大肆搜捕抗日志士。1933年9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被叛徒出卖，随后裴治云等同志被捕。

关押期间，以裴治云为首的12名

同志，受尽敌人酷刑的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屈服，用生命保护了躲在村外的我们。”时任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书记金成刚的女儿李在德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最终，无计可施的日军将12人活埋于枯井之中。

裴治云这位朝鲜籍的中共党员，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后来，山里大批隐蔽的同志重整旗鼓，再次组建起抗日武装，对侵华日军给予了沉重打击。这支队伍逐渐成长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力量——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新中国成立后，汤原县委、县政府于1982年8月在烈士英勇就义的枯井遗址旁，竖起一座纪念碑，向每一位前来瞻仰的参观者讲述那段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如今，在这片浸润着烈士鲜血的红色热土上，12位烈士的精神印记处处可寻。在汤原县鹤立镇，一座烈士

就义群像雕塑默默矗立。其中，裴治云标志性的“大胡子”格外醒目。他双手戴着镣铐，目光如炬、神色坚毅，展现出一位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

作为革命老区，汤原县辖区内纪念抗联英烈的纪念碑、雕塑多达35处。汤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范成龙说：“这些纪念设施于2022年全部完成修缮，每一处红色印记都得到妥善守护。”

依托红色印记，汤原县大力开展红色教育，让红色记忆深入人心。“云端党课”、红色宣讲团、遗址参观等特色教育活动，让24所中小学的9000余名师生在这片红色沃土上接受精神洗礼。松花江水奔流不息，在汤原这片英雄的土地上，裴治云等12位烈士的精神，正焕发出跨越时空的光芒。

(据新华社)

北方区委党校为革命“养成指导人才”



因应革命形势而生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要缔造“群众党”，必须扩大组织，发展党员。在此思想引导下，加之国共合作有利形势的推动，至1925年10月，党员达3000多名，是年初党的四大时的3倍左右。

发展有发展中的问题，即“党员数量增加，但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与当时不重视党内教育有关，“对于内部教育训练工夫，太没有注意”。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便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次年1月，党的四大决定，“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

具体到北方地区，也面临着组织发展而“指导人才”不足的困境。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进，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向好发展，革命影响逐渐扩至华北、东北、内蒙古等地区。1925年10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陈独秀肯定北方地区工作的同时，也指出问题，因“党的指挥不得力”，导致不但不顾及东三省和山西，对于北京邻近的天津、唐山两地方，也未曾有充分的指导。这次会议通过的《宣传问题决议案》，从宣传教

育领域讨论了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变成真正群众政党的组织”。议决案强调，“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教育一班政治知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

此次会议后，中共北京区委兼地委改组，正式组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李大钊担任书记。从其成立背景可以看出，北方区委的职责之一便是指导北方其他地区工作。然而实际情况是，当时许多干部理论水平不高，不能胜任指导工作。于是，筹建北方区委党校便提上了日程。

坚持守正与开新相统一

创办北方区委党校，是为革命培养“指导人才”，体现了理论学习服务现实革命的办学方向。开学典礼上，罗亦农专门强调，参训党员干部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做实际工作。赵世炎向学员交代学习的两重目的，即多学习理论知识与多吸取实际工作经验。

教学目的兼顾理论与实际，并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北方区委党校的授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赵世炎讲授的《列宁主义》、罗亦农讲授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历史唯物论》、陈乔年讲授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党的建设》等；二是中国革命形势与任务，如赵世炎讲授的《职工运动》

《农民运动》、刘伯庄讲授的《关于党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问题》、萧子暉讲授的《关于共青团的任务和学生运动》等。党校最后一讲是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李大钊要求学员从中国国情出发，重视农民运动。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渐跳出苏俄的城市中心论，走向中国实际，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体现。

理论联系实际，体现了北方区委党校坚持守正与开新相统一，即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开中国革命实践之新。北方区委党校坚持守正与开新相统一，还体现在对旅莫支部经验的学习与借鉴上。作为党校实际管理者的罗亦农，将他在旅莫支部的学习经验带到北方区委党校的教学管理中。最典型者是学习旅莫支部的分组学习、讨论。学员10人一组，推选产生1位组长。小组开会讨论学习体会与心得，并于每周汇报学习笔记和讨论记录交教务处审阅。

北方区委党校并非教条化地理解与学习域外经验，更有自己的尝试与突破，比如实行更加严格的学员管理。小组学习洋溢着民主气息，学员管理则体现了集中。罗亦农等人专门强调校规，严明纪律，学习期间对学员进行封闭式管理。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共产党唯有以内部最大的确定性，对抗外部复杂的不确定性。

为革命“养成指导人才”

北方区委党校学员陶永立、崔锄人

等在党校结业后奔赴唐山、大连、太原等地，用自己的所学指导革命实践，开展党务工作，发展党的组织。以崔锄人为例。他到太原后，很快组建太原特支，将一批超龄团员转为党员。后在北方区委指导下，崔锄人撤销太原特支并成立太原地委，担任地委书记。在其领导下，太原地委影响迅速扩大，下辖支部及党员人数快速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区委党校“养成指导人才”的经验，为以后其他党校“养成指导人才”提供了参考与借鉴。罗亦农从北京赴上海后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并在总结北方区委党校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创办上海区委党校。上海区委党校很多做法延续了北方区委党校的做法。比如罗亦农、王一飞、赵世炎等党员干部担任党校教员，负责党校教育培训，以党的直接领导保证党校教育内容的绝对正确。

北方区委党校因应革命形势而生，为解决组织发展中的问题而创立，开启了干部教育服务中心工作的传统；在教学与管理中，既借鉴经验又不拘泥于经验，既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理解中国革命实际，成为干部教育守正与开新相统一的发轫；为北方地区培养了“指导人才”，彰显了干部教育的育才初心。这些理念与做法在以后的干部教育中得以继承和发展，成为干部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

朱蕴山四度办学

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飘摇，朱蕴山以教育为刃，四次办学点燃革命火种，走出一条启迪民智、凝聚力量的独特道路。

1913年，朱蕴山在六安东河口镇的嵩寮崖，与进步青年创立“讲学会”“天足会”，反对缠足与封建礼教。他借为母守孝之机，将建于明末的朱家佛堂改建为“嵩寮小学”，自任校长，招收工农子弟。佛堂中的佛像被保留为艺术遗产，其余空间化为教室，他赋诗道：“佛堂变作读书堂，跻踞踟踌乐未央。”这所深山新学成为当地启蒙的灯塔，其外甥朱伟年在此启蒙，后走上革命道路。

1916年，反袁斗争失败后，朱蕴山意识到“教育救国”的迫切。他应刘希平之邀赴芜湖，参与创办芜湖公立职业学校，任驻校董事。学校设机械、木工、纺织三科，实行半工半读。同时，他与李光炯等人创立芜湖公立学校，招收清寒子弟，传播民主思想。这些学校成为安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孕育了李克农、许继慎等革命骨干。

1918年，朱蕴山返回六安，借废庵书院创办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他邀沈子修任校长，自任文牍兼修身课教员。学校废除读经，推行白话文，成立学生会参与校务。1920年，他组建了“中国革命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安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组织之一。崔其善、黄人祥等学生在此觉醒，后多成为皖西红军骨干，数十人先后为革命献身。

1944年，朱蕴山在重庆与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秘密集会，以纪念胡春霖之名筹建春霖中学。校址设于四川铜梁，李济深任董事长，朱蕴山为董事。学校以“工业救国”为宗旨，吸纳一大批国民党民主派和无党派人士组建民联，并借机掩护民联活动。抗战胜利后，学校迁至芜湖，继续为团结民主力量提供阵地。

朱蕴山的四次办学，从深山佛堂到战时课堂，始终紧扣时代脉搏，以教育为盾、思想为剑，在烽火中为中华民族培育希望的种子。

(据《人民政协报》)

一联三人写

抗日战争胜利后，丰子恺由大后方回到了故乡——浙江石门湾，不久又携全家迁居杭州静江路(今北山路)的一所平房。这屋位于西湖边，背靠葛岭，旁边是招贤寺，而寓所的大门正对着孤山北麓的林和靖放鹤亭。夕阳西斜时，他经常站在家门口石阶上眺望远方。一天，他触景而发，不假思索地吟了一句：“门对孤山放鹤亭。”话一出口，便觉得这无意说出的句子，倒是一句很好的对联，但是一时却对不上下联，就“暂付阙如”了。

几天后，上海开明书店的经理章锡琛来访，得知还缺一联，便帮他出了一个：“居近岳庙招贤寺。”虽然尚属工整，但一句中有庙有寺，犯了规格，觉得不妥，两个人又想不出更合适的字来。章锡琛回到上海后，把这副对联送叶圣陶过目。叶圣陶也熟悉杭州风景，就把“岳庙”改成“葛岭”，使这一联面目全非，变成了“居近葛岭招贤寺”。经过他们3人的改写，就成了这样一副对联：

居近葛岭招贤寺
门对孤山放鹤亭

这副对联对仗工整，在对联之中应算上乘。有了一副好对子，又是3个人合作的，本该挂在门口，可丰子恺不敢。为什么呢？他说：“我怕游客看见这对子，误认为这里也是风景点，天天有人到我家参观游览，我可就受不了了。”

(据《联谊报》)

“单兵之王”的立功喜报

在四川省金堂县金龙镇党员教育基地“星光·1953”红色空间，讲述了志愿军战士胡修道的成长经历，以及他在朝英勇作战立下赫赫战功的故事。

1931年10月，胡修道出生在金龙镇一个贫苦农家，从小给地主做杂役，常遭打骂。一次，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母亲文贵心疼地说：“你长大了，要好好做人，总有出头那一天！”这句话在他心里扎了根，从此他发誓要打倒旧社会的不公与不义。

1949年12月金堂县解放后，当地仍有土匪伺机作恶。一天，胡修道在集市上发现伪装混入人群的恶霸胡德茂。他马上跑去乡政府报告，协助驻乡解放军迅速出击，成功缉拿胡德茂。

1951年6月，胡修道瞒着母亲报名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文贵知道后没有阻拦，只是含泪说：“孩子，你这回要去，也是正理。到了朝鲜，要好好的，多写信来。”胡修道在进入上甘岭阵地前夕，收到了一封母亲的来信：家里生活啥都好，不用挂牵——就是缺个立功喜报。

1952年11月5日，上甘岭争夺战已进入白热化，胡修道与战友负责守卫597.9高地3号阵地。战斗中，班长前往9号阵地支援，另一名战友也负伤撤离，只剩胡修道一人坚守。

胡修道交替使用手榴弹和机关枪不断变换位置打击敌人，孤胆奋战直到支援的战友赶来。这一天，他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击退敌人41次进攻，歼敌280余人，创造了人民军队战争史上单兵作战的奇迹，被誉为上甘岭战役的“单兵之王”。1953年，胡修道被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记特等功，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和金星奖章。

母亲文贵接到胡修道的立功喜报，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战争胜利回国后，胡修道长期在部队工作，曾任解放军某集团军副参谋长。尽管职务不断提升，但他始终保持严于律己、公私分明的作风。

在胡修道儿子陈刚眼里，父亲是一个正直、纯粹的共产党员。“父亲对我们几个姐弟的教育很严格，从小就要求我们不能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陈刚回忆，小时候有一次他的右脚被扎伤，无法行走，姐姐想请父亲派车接送他上学，被胡修道严词拒绝：“车是用于工作的，绝不允许因私动用。”

在陈刚参军前，胡修道叮嘱儿子：在部队要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和战友们加强团结、注重学习，争当一个好兵。陈刚说：“父亲总是把身为党员的信念植根在自己心里，用言行举止，对我们进行潜移默化式的引导。”

胡修道家中，一直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惯。陈刚说：“小时候第三人的衣服都是父母穿过的旧军装裁剪改的。”胡修道去世后，子女整理遗物时发现，这位老战士的衣柜里除了几套旧军装，别无他物。

胡修道从朝鲜带回来的，不仅是“立功喜报”，更是“精神战报”。他将从母亲那里种下的朴素信念，淬炼为共产党员的赤胆忠诚和清明家风。这份精神，至今仍在传承。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